

## 論文

## 董國英及其《楚辭貫》研究

李國榮\* 陳亮\*\*

## 中文摘要

清代學者董國英所著《楚辭貫》一書是其重要楚辭研究著作。學界對於董國英的籍貫一直存在爭議，現在基本可以確定為浙江杭州臨安人。《楚辭貫》一書主要針對屈原《離騷》加以注解，董國英結合《史記·屈原列傳》中的屈原生平，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提煉出貫穿全文的「修己」與「取人」兩大主旨，立足文本主旨以分析文章結構，以求貫通全文。在文本解讀方面，董國英對前代注家的注解進行了批駁與糾正，並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全書以魯筆《楚辭達》為藍本，並受到林雲銘影響，從而兼備章句學派與經學派之楚辭注解特色。

**關鍵字：**《楚辭貫》、董國英、清代楚辭研究

## 一、董國英生平考略

董國英，生於公元 1729 年（清雍正七年），卒於公元 1800-1813 年之間，字逸倫，昌化博川人（今屬浙江臨安），以諸生終老。關於董國英的生平，由於史書記載較少，其著作又均已散佚，因此學界歷來存在諸多爭議，許多問題也不夠清晰，現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將相關問題作一簡要梳理。

## （一）國籍考略

據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所錄，董國英為朝鮮人。<sup>1</sup>而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著錄「《楚辭貫》一卷，清董國英撰。」<sup>2</sup>周建忠《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著錄「董國英，字逸倫，博川（今屬山東）人。」<sup>3</sup>由此可見學者們對於董國英的國籍有不同認識。筆者翻檢歷代書目，發現《清史稿》記載：「《楚辭貫》一卷，董國英撰。」<sup>4</sup>再有《八千卷樓書目》卷十五集部中

---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楚辭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13&ZD112)

\* 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副教授

<sup>1</sup> 董國英：《楚辭貫》，收入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第 80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頁 554-680。

<sup>2</sup>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24-225。

<sup>3</sup> 周建忠，施仲貞：《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1 年，頁 108-109。

<sup>4</sup> 趙爾巽：《清史稿》，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002。

記載：「《楚詞貫》一卷，國朝董國英撰刊本。」<sup>5</sup>可見清代確有董國英其人，並撰述《楚辭貫》一卷。此外，根據該書序言可知學者羅以智曾為該書作序，筆者更考其人，發現羅訓森主編《中國羅氏通譜》第一冊錄有「羅以智，字鏡泉，錢塘人，家藏書甚富，聞有異本，必抄錄之。著有《趙清獻年譜》、《文廟從祀賢儒考》、《新門散記》、《經史質疑》」一條。<sup>6</sup>另有申暢《中國目錄學家辭典》收錄「羅以智」一條，<sup>7</sup>將其內容與羅以智序文落款「道光癸卯閏秋錢唐羅以智」及董希仲跋文「越壬寅，武陵羅鏡泉學博僑寓昌南」兩相對照，可確證羅以智應為杭州錢塘人士。同時由董希仲所作跋文可知，董國英之甥程章曾參與校刊該書，筆者查閱浙江省《民國昌化縣誌》，發現其卷九「選舉志」載有「咸豐 程章 辛亥科恩貢」條目，同書卷十四「新增殉難忠義表 紳士表」下有「程章」並「生員董希仲」條及其事跡。<sup>8</sup>綜合上述材料可知，為《楚辭貫》一書作序並參與校刊者均為清朝人士，且董希仲與程章等人與董國英有親屬關係，若將董國英認定為朝鮮人，頗為不合情理。

## （二）籍貫考略

當今學者一致認同董國英為「昌化博川人，」但其具體位置難以確定。部分學者認為昌化在今浙江，如潘嘯龍《楚辭著作提要》認為：「董國英，字逸倫，昌化（今浙江省臨安縣）博川人。」<sup>9</sup>再有《清代詩話考述》中記載：「董國英，浙江昌化博川人，諸生。約生於雍正七年（1729），卒于嘉慶五年（1800）之後。」<sup>10</sup>《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中認為博川今屬山東，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以朝鮮博川郡為準，將董國英歸為朝鮮人。由於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行政區域劃分不同，各地地名亦多有重複變更，因此「昌化博川」的具體位置存在諸多分歧。提及「昌化」與「博川」的資料很多，如劉永智《中朝關係史研究》指出博川郡本屬遼東郡，後為高麗所取，至李朝太宗十三年命名為博川郡。<sup>11</sup>顧德如《中外 8000 大中城市概況》中載

<sup>5</sup> 丁立中：《八千卷樓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379。

<sup>6</sup> 羅訓森主編：《中華羅氏通譜》第一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頁607。

<sup>7</sup> 申暢等編：《中國目錄學家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22。

<sup>8</sup> 陳培琰：《民國昌化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24年，頁542，頁980，頁986。

<sup>9</sup> 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6-209。

<sup>10</sup> 吳宏一：《清代詩話考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頁1598-1599。

<sup>11</sup> 劉永智：《中朝關係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90。

有：「博川，朝鮮北部城市，博川郡首府。」<sup>12</sup>在《中國歷史地圖集》所繪清時期圖組中，涵蓋「昌化」的共兩處，一處在浙江圖中，屬於杭州府部分。一處在廣東圖中，屬於瓊州府部分。<sup>13</sup>《楚辭貫》原書扉頁署有「唐昌董逸倫論釋」字樣，「逸倫」是董國英的字，《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記載：「昌化縣治。……秦漢晉為於潛地。唐初紫溪縣。析置武隆縣。循省入，又復置，改唐山，或稱唐昌。吳越更名金昌。唐復故。晉改橫山，後改吳昌。宋太平興國三年改昌化。元明清因之。」<sup>14</sup>據此可知「唐昌」是浙江昌化的另一個名稱。再有民國時期《浙江省昌化縣誌》卷十八書目集部曾明確載錄《離騷貫》一卷，題為「諸生董國英注」，同書卷十三「節婦」編，董家烈繼妻畢氏條下云：「（畢氏）上博莊人，年二十三歸董，夫已抱疾，奉湯藥惟謹，逾年夫亡，時翁諱國英，府庠生，為邑名宿，問字者無虛日……」<sup>15</sup>其他昌化縣的史料中並未提及董國英，因此基本可以確定董國英為浙江省昌化縣人士。又據陳橋驛《浙江古今地名辭典》中記載：「昌化縣，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納土歸宋，改吳昌縣為昌化縣，以示昌地歸化之意。縣治即今昌化鎮，屬杭州。南宋屬臨安府，元屬杭州路，明、清屬杭州府……1960年昌化縣撤銷併入臨安縣，劃屬杭州市。」<sup>16</sup>綜上，董國英所在「昌化」應屬於今浙江省杭州市臨安縣。

### （三）生卒年考略

以上多種記載均認為董國英生於清雍正七年（1729），其卒年至今仍未有定論。董國英在《楚辭貫》「凡例」中自注「嘉慶五年，歲在庚申，臘月之吉，博川董國英識，時年七十有二。」此外，學者余蓮與羅以智所作序文與其曾孫董希仲所作跋文中關於董氏生平略有涉及，我們可從中推之一二。羅以智所作序言中提及「先生名國英，……今歿且三十余載，著是書時，嘉慶庚申之歲，余甫生，先生年已七十有二矣。」嘉慶庚寅年為公元1800年，由此可以推斷董國英生年為公元1729年，即清雍正七年。但董氏卒年已不可確考，只能根據羅以智序言大致推測。羅以智為《楚辭貫》

<sup>12</sup>顧德如，彭克宏主編：《中外8000大中城市概況（上）》，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年，頁410。

<sup>13</sup>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31-32，頁44-45。

<sup>14</sup>林傳甲總纂：《大中華浙江省地理志》，杭州：浙江印刷公司，1918年，頁185。

<sup>15</sup>陳培珽：《民國昌化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24年，頁821-1480。

<sup>16</sup>陳橋驛：《浙江古今地名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399。

作序時正值道光癸卯年間，即道光二十三年（公元 1843 年），此時董國英「歿且三十餘載，」可以推測其卒年大致在公元 1800-1813 年之間。

董國英以諸生終老，但其既「為邑名宿，問字者無虛日，」可以想見其一生應有其他著作，遺憾的是除《楚辭貫》一書外，均未能得以留存。晷亮于《〈楚辭書目五種〉補考五則》中曾提及董氏「其他不可詳考，惟知所撰《傳經堂家規》一卷，在民國十年董瑞椿排印本《勉不足齋四種》中。」<sup>17</sup>《傳經堂家規》現存於國家圖書館古籍部，通過文獻傳遞後，筆者翻檢此書，發現該書實為清代另一名董國英所著，其人學名國英，祀名鴻達，字掖雲，號恬齋，婺源人，清故增廣生，生於乾隆六年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歿于嘉慶年間。與本文提到的董國英生平資料不符，可見二者並非同一人。

## 二、《楚辭貫》評析

《楚辭貫》全書凡一卷，雖名為「楚辭」貫，實際只收錄《離騷》一篇。董國英認為司馬遷在《列傳》中詳言《離騷》，對於《天問》、《招魂》、《哀郢》等則一筆帶過，是因為《離騷》一篇已然包舉全部、全義、全神，看透此篇，以後各篇自可迎刃而解。同時《列傳》僅為《離騷》一篇注腳，因此《楚辭貫》全書亦僅為《離騷》一文作注解。

### （一）注釋體例

細看全書體例，開篇為後世學者羅以智與余蓮所作的兩篇序言，大致談及董國英的創作動機與成書過程，並對該書作出簡要評價。序言之後附有《史記·屈原列傳》原文，但並不完整，部分文字有所省略。同時以眉批的形式說明對《列傳》與《離騷》之間關係的看法，道出全書主要思想，即圍繞「修己」與「取人」兩點為《離騷》作注。其後為作者所作《凡例》六條，具體說明注疏原則、創作動機及全書體例。正文部分注解《離騷》全文，正文之後是其曾孫董希仲所作之跋，簡單敘述了成書過程，並附有參與校對者的身份姓名。

正文部分的注釋體例採用逐句注釋、評注相兼的方法。全書注解文本多依魯筆《楚辭達》與林雲銘《楚辭燈》之注釋，董國英並未將精力過多投注在字句訓詁與典故闡釋之上，而是重點圍繞文章主旨大意，從作品結構層次入手，分析語句及段落之間的聯繫，力求以主旨貫通全文，解讀作品。間以眉批表達見解，或分析篇章結構，或點評字句，或點明寫作主旨。

---

<sup>17</sup>晷亮：《〈楚辭書目五種〉補考五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 年第 3 期。

可以看出在分析文本時，董國英頗具整體觀，他將全文分為前後兩篇，並進行了細緻的段落劃分，段後則具體分析該段章法，評析大意，致力於理清前後文之間的關係，疏通文脈。譬如在分析《離騷》前半篇時，他著重指出五段中重言修己之事者有三，重言取人之事者有四，並給出了詳細論述，對文中難解之處進行了梳理。舊編著作中，文章佳妙處常常用密圈標出，而董國英則認為「人之意見不同，文極於工，則隨指一句，或采其詞調，或取其音節，或賞其氣骨，或喜其神味與風韻，字字皆佳妙可圈，」<sup>18</sup>反不如「使人人各以其意見賞識其佳妙，」因此書中並無過多圈點標記之處，但涉及主旨之處往往用方框著重標明，如「嫉賢」「舉賢」「任能」「好修」「靈修」「修名」等字眼處均有標記，以表明屈子修己與「取人」之志。

## （二）注釋特色

《楚辭貫》全書將注解重點放在結合主旨闡釋文義、理清文脈之上，避免了一味的典故考據與枯燥說教，在闡發主旨的同時順其自然的表達了對忠君、愛國觀點的讚賞，與宋儒解讀時的空洞說教涇渭分明。同時董注之特色在於在注解中往往設身處地，以己意去體會作者之本意，並立足於屈原的角度加以陳述，因而能夠以情服人。如注解「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時，注曰：

乃民情好尚不同，初服雖美，奈非其所好，何於是上不合於吾君，中不宜於僚友，下不協於民情，離群索處，不既孤而無偶乎？乃余則始終不懈，唯獨好修以為常耳，蓋所好根於天性，雖至支體之解而此情不變，豈以不合於世遂懲戒其心，而致改途易轍哉。<sup>19</sup>

如此便將屈原之文意簡潔直白地表述出來，達到人人可解的效果。

前人在研究《離騷》時，對《史記·屈原列傳》已多有關注，如錢澄之在其《離騷總詁》中就對《列傳》多有引用，從而結合屈原生平遭遇及其「美政」理想來梳理《離騷》內容。林雲銘《楚辭燈》與屈復《楚辭新集注》中亦將《列傳》置於正文之前，以作參考。《楚辭貫》的獨特之處在於，書中並非單純羅列《列傳》以備參考，而是採用眉批的形式對《列傳》與《離騷》之間的聯繫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以知人論世的方法，將《列傳》

<sup>18</sup>引自（清）董國英：《楚辭貫》，見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第8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580-581。

<sup>19</sup>引自（清）董國英：《楚辭貫》，見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第8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618。

中提到的楚國政治情況及屈原生平與《離騷》之主旨聯繫起來。

董國英認為《列傳》首先點明了屈原作《騷》之緣由，即「怨」。屈原一生「正道直行，竭智盡忠」，然而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至於見疏見替，終至無路可走，滿腹怨忿，因而宣洩為一篇怨詞，這是理解《離騷》的根本所在，也說明了《離騷》一文的基本情感趨向。其次點明了《離騷》中的「修己」與「取人」兩大主旨。《列傳》開篇即指出屈原在位時，政教修明，國家治平，均是君王善於取賢人之故，為「取人」作注腳。篇中敘述屈原為小人所害，見疏見替之後，楚王屢為張儀所欺，在秦國面前步步後退，乃至兵挫地削，懷王本人客死他國，字字句句都揭示出不用賢之禍，同樣為「取人」注腳。同時，懷王之所以屢屢見欺于秦，皆因一「貪」字，利令智昏，由此而愚，乃至為小人蒙蔽，以賢者為不賢，不賢者為賢，可見君王不能修己之禍，這是為「修己」作注腳。此外，《列傳》指出楚王因聽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等小人之言而疏屈原，由此生出《離騷》中「取賢士」之感，而懷王惑于寵姬鄭袖，以致再次受欺于張儀，由此生出《離騷》中「求女」之懷。總之，正是因為懷王不能修身取人，才會導致疏屈原，近小人，最後以悲劇收場。因此董氏總結出屈原畢生之政治理想就在於冀幸君王能夠修身取人，《離騷》全文亦是圍繞「修己」與「取人」兩大主旨寫成。文中反復強調「修己」，既有勸君主提高自身修養，明智以明政的含義，也有勉勵自身加強修養，為君輔助之意。而「取人」既有勸君廣納賢人，不為小人所蒙蔽之意，也有彰顯自身勤懇攬才，為君添翼之意。要想理解《離騷》，理清屈子之志，必須要從「修己」與「取人」兩方面入手，這是董氏解讀《離騷》的根本所在。董國英認為，讀懂《列傳》中提到的史實，理清屈原畢生之志向，也就讀懂了《離騷》。因此在注解《離騷》時，他將重點放在對大旨的剖析上，時刻不離修己、取人，並以此來融會全書。

注重章法、脈絡是清代楚辭研究章句學派學者的主要著述特點，這一注解方式在清代楚辭研究方面影響頗深。諸多楚辭研究學者在著作中都致力於剖析文章結構，注重脈絡條貫，力求理清主旨大意，如王邦采所言：「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誦習其辭章、聲調已也，必審其結構焉，必尋其脈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段落清，脈絡通而後詞義貫，性情得而後心氣平。」<sup>20</sup>董國英注解《離騷》時，在文章結構劃分與脈絡梳理方面細緻

---

<sup>20</sup>引自（清）王邦采：《屈子離騷匯訂三段雜文箋略》，見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

周詳，用力極深，而不事繁瑣的考據訓詁。全書在劃分文章段落與分析文意時往往圍繞「修己」與「取人」兩大主旨，緊扣主題並能自圓其說。董氏認為屈原作《離騷》一文，全在於一個「怨」字，主要在於怨王，次要在於怨黨人。最後一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是一篇大旨，與開篇以正而生相呼應，揭示最後以死諫王之結局，中間以「修己」「取人」兩大旨意貫穿全文，結構全篇。「取人」又可分為兩項，一項是針對令尹子蘭等黨人而求賢士，一項是針對鄭袖而求淑女，從而將前後篇連接起來。前半篇主要是闡述屈子自身之修己取人，以及慨歎黨人與楚王之不能修己取人，並自敘其諫王修己取人而終見疏見替。後半篇則闡述屈子秉持忠君愛國之心志，以致上征天庭，下至列國，無人可與修己取人，最終無處可容身，不得不「從彭咸之所居」。整體看來《離騷》全文首尾相呼應，條理分明，脈絡清晰，宛如一體。

### 三、《楚辭貫》之繼承前人

目前學界將清初至中期楚辭研究大致分為三類：經學者之楚辭研究、朴學者之楚辭研究和章句學者之楚辭研究。<sup>21</sup>董國英在凡例中已言明著作是以魯筆《楚辭達》為藍本，同時對林雲銘《楚辭燈》亦有提及。魯筆是清代楚辭研究中章句學派代表人物，林雲銘是經學派之代表人物，因此董氏書中自然結合了二者之特色，既有章句學派重視文章脈絡的特點，又在行文之中對儒家的道德觀念做了簡略闡發。

《楚辭貫》全書中對於魯筆注解的繼承之處大致有以下三點：

一是字句訓釋。董國英注解不事考據，其字詞注解部分大都直接引用魯筆或林雲銘之注解，有時標明「魯注」二字，以示傳承，這種方法多用在注解單個字詞時。有時略微改動一二字。如注解「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無穢」一句時，注曰：

承上言培植善類，原欲極其道德才華之盛，以待時取為國家之用，乃我既見疏，彼亦同歸廢棄。我則雖因見疏而致萎絕，亦何足惜，特不能不為諸賢歎耳。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痛何如之。<sup>22</sup>

僅在「不能不為諸賢歎耳」一句前加一「特」字，其余部分均為魯注之原文。有時則採用化用的辦法，將魯筆的觀點融匯於自己的注解之中，這

刊》第5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384。

<sup>21</sup>可參見孫巧云《元明清楚辭學史》，杭州：杭州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

<sup>22</sup>引自（清）董國英：《楚辭貫》，見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第8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598。

種方法多用於分析屈子寫作旨意與情感之時。

二是以情釋文。前文中已提到董氏在注解《離騷》時往往以屈子的口吻來解釋文章大意，以情感角度闡釋文本，這種方法便是來自魯筆的注解。例如魯筆在注解「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一句時注曰：

我之初服既修成，則吾進退豈不綽有餘裕哉。乃忽焉回頭近顧而遠覽焉，國中穢濁無人，已不足觀矣。吾身芳潔，已不可往而見汙矣。然則將何之而可，或者寬閑之野、寂寞之濱，猶有好修如吾、隱居樂道者乎。吾將往觀焉。如是被吾復修之盛服以往，不因處荒落之境稍減其修飾，庶可藉此以邀知己，未可知也。<sup>23</sup>

整段注解猶如屈子之內心獨白，「我」字、「吾」字的運用十分恰當。這種方法為董國英所吸取，在《楚辭貫》一書中，亦多用「我」字、「余」字以表達屈子之情志，且闡釋多較為合理，使人讀來有親近之意。此外，董國英在注解《離騷》時重視文脈梳理，按照段落歸納文章大意，並且注重段落之間以及上下文之間的聯繫，也可以看出是受到魯筆注解方式的影響，二人同源于清代楚辭注解的章句一派。

三是劃分文脈。魯筆將《離騷》全文劃分為上下兩篇，十二大段，前五段為上半篇，後七段為下半篇，而董國英在凡例中指出《離騷》可分為前後篇，其中前半篇五段，後半篇六段，中間「女嬃」一段獨立為過文，不屬於前後段之列。事實上在後文中具體劃分時，董國英仍是將「女嬃」一段劃為了第六段，因此與《楚辭達》區別不大，均可以看做十二段分法。細微差別在於，《楚辭達》中往往將過渡句歸為上一段，而董國英則將之歸入後一段中。魯筆認為前半篇亦應有過文，而董國英指出前半篇「一氣轉接，五段如一段，」因而無須過文。此外，二人在劃分段落時的依據並不相同，董國英往往根據文章主旨是側重修己還是側重取人來劃分文章脈絡。

董國英在注解時多以演繹魯注為主，然而並不能據此就說《楚辭貫》一書之注解全無可取之處，事實上該書注解在取法前人的基礎上，對《楚辭達》中存闕之處多有思考和訂正。書中於見解不同之處往往採用「愚謂」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想法，有些觀點亦頗為合理。如注解「扈江離與辟芷兮，

---

<sup>23</sup>引自（清）魯筆：《楚辭達》，見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第 4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頁 470。

「纫秋蘭以為佩」一句時結合「修己」旨意指出，屈子之所以「扈江離」與「辟芷」，是因為二者生長于江濱僻壤，潔而不淤，遠而不俗。至於「秋蘭」則更有深意，蘭多芳于春夏，秋蘭則獨芳於草木零落之時，猶如松柏，象徵著屈原一生之節概。同時董國英提出，這三種香草均為後文做了鋪墊，如「江離」是後文「飲墜露」與「餐落英」之本，「芷」是後文不為時俗之工巧之本，「秋蘭」是後文九死未悔，乃至從彭咸所居之本，其見解頗合情理。董國英還對旧注中存在爭議的地方進行了解讀，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最為典型的是對於「哀高丘之無女」之「無女」與後文中「求女」的解釋，魯筆將之解釋為求賢相，且隱刺子蘭、鄭袖二人。而董國英則指出，令尹子蘭應歸入黨人類，在前文中已有指斥，後文中的求女應僅隱刺鄭袖，並舉出《列傳》史實加以說明，當日楚王內惑于宮中，以至於身死異國，均因鄭袖之禍，而宮宦之事，屈子不便明言，只得採用隱刺手法，以女刺女。這種觀點亦頗有可取之處。

董國英在凡例中曾提及林雲銘之《楚辭燈》「頗有端緒可尋」，文中注解部分亦對林氏之注解多有倚重。林雲銘作為清代楚辭研究經學派的代表，其注解方式亦對董國英產生了影響，使得《楚辭貫》行文之中帶上了經學派的影子。在分析《列傳》與《離騷》之間的關係時，董國英曾經批註曰「甚矣，屈子之忠也」，將屈原定位為忠臣，對其最後「從彭咸之所居」的死諫行為擊節讚賞，並將《離騷》定位為「憂君憂國」之文字，如在注解「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時，批註曰「篇中無數波瀾，總從一片憂國憂民熟腸迸出」。同時他將文章主旨定義為「修己」與「取人」，亦可以看出儒家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觀點的影子。更為典型的是在注解「女嬃」時，董國英注曰：

上文由朝廷說到四荒之民，已經說到盡頭處，忽又突出一女郎，殊覺不類，細思君臣屬尊一邊，民生屬卑一邊，皆系疏外一邊，至此則合尊卑，內外親疏無一窒漏，而國真無一人知矣。<sup>24</sup>

以尊卑親疏來劃分君臣、百姓，可見其受到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

#### 四、小結

回顧本文各章節的分析討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sup>24</sup>引自（清）董國英：《楚辭貫》，見黃靈庚《楚辭文獻叢刊》第8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622。

首先，董國英對《離騷》文本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體現在對文章結構的分析與脈絡的梳理上，另一方面體現在對主旨的提煉與文意的闡發上。全書特色在於致力於通過提煉文章主旨來梳理文章結構，董國英通過結合《列傳》中的屈原生平與楚國當時的政治局勢，提取出屈原《離騷》一文的創作動機與情感趨向，並將其與文本結合起來，從而對《離騷》之行文與文章脈絡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梳理，較為客觀、準確地把握了作品的內涵。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受章句學派影響頗深，因此全書在脈絡梳理上用力頗深，而在注解訓詁方面則多引前人觀點。在分析文本結構時，董國英亦頗具整體觀念，以「修己」與「取人」為線索，對文本進行了細緻的劃分，盡力做到了融會全書。

此外，董國英在注解《離騷》時，亦受到經學者之注解楚辭的影響，在行文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帶入了儒家之正統道德觀念。他將《離騷》一文主旨定位為修己取人，將屈子定位為忠臣，將其情感定位為憂君憂國，在行文中涉及到了「宗國」「尊卑」之觀點，凡此種種，均可見出經學者之影響。

比之清代諸多楚辭研究著作，《楚辭貫》並非其中佼佼者，其流傳與影響也遠不及其他著作。然董國英將其畢生心血傾於《離騷》，汲汲于爬梳原文脈絡、貫通全文章旨、剖析屈子心志，在成果豐碩的清代楚辭學史長河中，不失為一朵值得掇取的浪花。

### **The study of ChuCiGuan and Dong Guoying**

Li Guorong    Chen Liang

**Abstract :** "ChuCiGuan" w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work on Chu ci by Dong Guoying, a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Dong Guoying was born in Lin 'an, Hang Zhou, Zhejiang province. His work was mainly aimed at Lisao. Dong Guoying had put forward two main themes of repairing oneself and selecting talents throughout Lisao, and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cle through refining the main idea of the text, in order to get through the whole text. He also refuted and corrected the annotations of previous annotators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unique views on some issues. The book was based on Lu Bi's ChuCiDa and Lin Yunming's research.

**Key words:** ChuCiGuan; Dong Guoying; Study of Chu ci in Qing dynasty